



湖南省社会科学学术著作资助出版

《少年中国》 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

“shaonian zhongguo”
yu wusi shiqi shehui sichao

李永春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HUNANRENMINCHUBANSHE

湖南省社会科学学术著作资助出版

《少年中国》 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

“shaonian zhongguo”
yu wusi shiqi shehui si chao

李永春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少年中国》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 / 李永春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5. 11

ISBN 7-5438-4173-8

I. 少... II. 李... III. 少年中国 - 影响 - 社会思
潮 - 研究 - 中国 - 现代 IV. D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8666 号

责任编辑: 邓胜文

装帧设计: 胡薇薇

《少年中国》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

李永春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hnppp.com>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编: 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科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25

字数: 537,000

ISBN 7-5438-4173-8

K·744 定价: 35.00 元

序

郭汉民

《〈少年中国〉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是李永春博士的学位论文（以下简称李著），2004年经过严格评审，获得湖南省第八届优秀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就要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

三年前，我所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杨代春同志的博士论文获得湖南省第五届优秀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题目是《〈万国公报〉与晚清中西文化交流》，2002年9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两本著作的共同之处都是以近代重要报刊为研究对象，在深入细微的文本研究基础上，透视其对近代中国所造成的深刻影响。《万国公报》是近代著名寓华传教士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所办的最具盛名的大型中文报纸，从1874年到1907年（中间有数年停顿）前后延续将近40年，在晚清中西文化交流中起过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少年中国》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社团少年中国学会所创办的机关刊物，从1919年7月发刊到1924年5月停刊，前后历时6年，其时正是五四时期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的时期，通过这份影响巨大的刊物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精确地认识五四时期的社会思潮及其走向。杨代春博士和李永春博士先后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完成了各自的任务，其学术价值显然已获得专家学者的初步认可。

报刊作为近代化社会变迁中产生的大众传媒，包含着多方面丰富的信息。有些报刊，可以反映某些党派的政治思想与政治活动，或者可以反映某种特定的社会思潮或几种思想的斗争情况。所以报刊不仅可以成为史学研究的材料之一，而且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报刊应当成为专题研究的对象。《少年中国》不仅是研究少年中国学会发展与分化的宝贵资料，而且在宣传新文化新思潮方面，具有重要地位，与五四时期的著名刊物《新青年》和《新潮》杂志鼎足而三，但与后两种杂志相比，《少年中国》研究实际上则处于起步阶段，李永春的这项研究显然有助于我们对

五四时期社会思潮认识的深化。

对《少年中国》杂志本身作比较深入细微的考察，是李著的特色之一。以往学术界对《少年中国》杂志虽有评介，但却失之简略。李著以两章的篇幅考察《少年中国》的创刊缘起、宗旨、编辑与出版发行，考察该杂志的稿源、作者群、读者群、栏目设置及其变化。《少年中国》杂志属于大众传媒。美国传播学家拉斯韦尔将大众传播视为一个过程，它包括“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给谁—取得什么效果”五个环节，缺一不可，即所谓“五W”模式。“谁”与“给谁”便是指“作者”与“读者”，“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取得什么效果”即“信息”、“媒介”与“影响”。李著将“作者”扩大到编辑（含办刊宗旨及栏目设置）与作者的群体进行分析，将读者也作为群体加以考察，通过研究《少年中国》杂志的发行渠道及作者思想变化、读者反馈信息揭示其社会影响，特别是通过分析其信息内容具体地考察《少年中国》的思想主张及其与当时社会思潮的互动关系。这是一个艰苦的、细致的、前人尚未做过的工作，有助于人们全面认识《少年中国》月刊的性质、特点及其社会影响。书中经过认真梳理、统计而列出的图表与数字，将为相关的研究者提供方便。

在扎实的文本研究的基础上，具体而微地揭示出《少年中国》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的互动关系是李著的鲜明特色。以往人们论及五四时期社会思潮的发展情况时，多从宏观上着眼，泛泛而论者居多。李著在认真解读《少年中国》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梳理出了国家主义教育思潮、非基督教思潮、工读互助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思潮等四种主要的社会思潮，并对其作了较深入的剖析。如非基督教思潮的兴起与发展，李著系统地揭示了《少年中国》杂志从发起宗教问题讨论，到举办宗教问题讲演，到发刊宗教问题专号，再到反对基督教、反对教会教育，最后策动收回教育权的全过程，具体论析了少年中国学会和《少年中国》杂志在反基督教思潮中的领导地位及在转变过程中的突出作用，其对田汉、周太玄、李璜等人宗教思想的剖析，也是发前人所未发的。以往人们普遍认为，少年中国学会受科学主义思潮影响至深，李著对《少年中国》所标榜的“科学的精神”与科学主义思潮的关系以及科学与宗教的对立问题，作了具体解析，对上述定论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辩正。李著运用大众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在深入研究《少年中国》反映的社会思潮的具体

内容时，着力揭示这种宣传与介绍对社会舆论界和广大读者的影响，尤其是“宗教问题号”、“少年中国学会问题号”以及国家主义教育宣传对作者与读者的影响，进而揭示了《少年中国》的这种宣传对于少年中国学会，对于《少年中国》地位与影响的积极意义，从而真正揭示出《少年中国》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的互动作用。

李著值得一读的第三个特色是在论述五四时期社会思潮时，始终立足于《少年中国》月刊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坚持实证研究，把《少年中国》作者的文章所反映的思想倾向与复杂的社会思潮联系起来，不回避政治思想与意识形态问题，不作简单的褒贬与价值评判，而是从当时学理探讨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评价社会思潮与相关历史人物，尽可能地得出科学结论，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往人们研究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多侧重于科学社会主义如何战胜无政府主义和各种假社会主义的过程，李著通过《少年中国》杂志对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作深入而具体的个案研究，指出当时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不论是倾向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团聚在社会主义旗帜之下，在《少年中国》月刊上自由研究和讨论各自信仰的社会主义，共同从事社会主义的“预备”与训练，同时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有组织地进行学理研究。正是在确立学会共同主义的讨论中，围绕着是否以社会主义为共同主义及改造学会为社会主义团体，发生了共产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尖锐对立，导致了学会的分化。以往人们谈论国家主义，往往从政治上着眼，予以根本否定，并认为共产党人与国家主义派始终是对立的。李著通过揭示《少年中国》杂志所宣传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潮，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少年中国学会亦将国家主义教育纳入会员共同的主义预备与训练之中，以教育作为社会活动的下手处，部分会员从宣传和实验国家主义教育而与“醒狮派”所提倡的国家主义教育引为同调。会员中的早期共产党人对国家主义教育并非一开始就持反对态度，而是经历了一个同情、利用、批评到反对的转变过程。从而对传统的说法有所驳正。对于少年中国学会内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来源，李著也作了较之以前更为客观的分析。

当然，李著也有自己的缺陷。引征资料丰富，是其长处，但引征过多又失之繁琐，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文笔的流畅和语言的精练。一个青年史学工作者，往往会出现两种毛病，一是忽视第一手资料的占有和使用，空发议论，缺乏说服力；二是注意收集和运用第一手资料，却又

会被这些资料牵着鼻子走，出现史料堆砌的问题。只有在史学研究的进一步实践中才能克服这些毛病而逐渐成熟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年史学工作者的后一种毛病又不宜苛求，而前一种毛病应当力戒。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愿意将李著推荐给读者，并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教。谨以此为序。

于湘潭大学北斗村

二〇〇四年十月

目 录

序	郭汉民(1)
引 言	(1)
第一章 《少年中国》月刊研究(上)	(7)
一、《少年中国》研究回顾与展望	(8)
1. 《少年中国》研究概况	(8)
2. 《少年中国》研究综述	(11)
3. 拓展五四时期社会思潮研究的思路	(23)
二、《少年中国》的缘起	(28)
1. 《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简介	(28)
2. 《少年中国》的创办	(31)
3. 《少年中国》的编排设计	(33)
4. 《少年中国》创刊的经费问题	(36)
三、《少年中国》的宗旨	(38)
1. 《少年中国》宗旨的提出	(38)
2. 《少年中国》宗旨的内涵与理解	(39)
3. 《少年中国》与《少年世界》的宗旨比较	(41)
四、《少年中国》的编辑	(43)
1. 《少年中国》的编辑办法	(43)
2. 《少年中国》的编辑方针	(53)
五、《少年中国》的出版发行	(60)
1. 《少年中国》的出版发行办法	(60)
2. 《少年中国》的发行量	(67)
3. 《少年中国》的再版问题	(72)
4. 《少年中国》的价目	(73)

5. 《少年中国》出版延期的问题	(74)
第二章 《少年中国》月刊研究(下)	(87)
一、《少年中国》的稿源	(87)
1. 稿件的分类	(88)
2. 稿件的来源	(92)
3. 稿件的要求	(95)
二、《少年中国》的作者群	(100)
1. 月刊作者群的构成	(101)
2. 以笔名或字号发表作品的作者	(115)
三、《少年中国》的读者群	(115)
1. 读者数的初步估量	(116)
2. 读者群的层次分析	(117)
四、《少年中国》的栏目	(126)
1. 栏目设置简况	(126)
2. 学理文字栏	(127)
3. 新诗栏	(141)
4. 学会消息栏	(144)
5. 附录栏	(148)
6. 广告栏	(150)
第三章 《少年中国》与工读互助主义思潮	(156)
一、《少年中国》的小组织讨论	(157)
1. 小组织问题的热烈讨论	(158)
2. 小组织问题讨论的评价	(165)
二、少年中国学会与工读互助主义的实验	(167)
1. 王光祈工读互助主义思想的来源	(167)
2. 工读互助主义向现实运动的转变	(170)
3. 王光祈与工读互助主义实验的倡议发起	(176)
4. 少年中国学会对工读互助主义的提倡	(181)
5. 发起人对北京工读互助主义的认同与实验的支持	(186)
三、工读互助主义实验的社会影响	(191)

1. 由少数人的思想主张变成部分青年学生的 新生活实践	(191)
2. 各地工读互助团仿效的模范	(194)
3. 一次新教育的有益尝试	(195)
4. 对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7)
四、工读互助主义实验对少年中国学会分化的影响	(198)
1. 社会各界对北京工读互助团失败的反思	(199)
2. 王光祈与恽代英的反思和争论	(200)
3. 工读互助主义实验对于学会分化的实际影响	(205)
第四章 《少年中国》与非基督教思潮	(214)
一、《少年中国》关于教徒入会的讨论	(215)
1. 教徒不得入会决议案	(216)
2. 田汉对决议案的强烈抗议	(219)
3. 南京大会关于宗教信仰问题的决议	(225)
二、《少年中国》关于宗教问题的研究与讨论	(227)
1. 宗教问题讲演	(228)
2. 《少年中国》宗教问题号	(241)
3. 《少年中国》关于宗教问题的通信讨论与著译	(256)
三、《少年中国》的非基督教思想	(259)
1. 反宗教重心的转移与态度的变化	(259)
2. 非基督教的基本思想	(266)
四、《少年中国》非基督教的理论武器	(274)
1. 科学主义	(275)
2. 社会主义	(292)
3. 民族主义	(302)
4. 国家主义	(310)
五、《少年中国》非基督教思想的个案分析	(318)
1. 恽代英的非基督教思想	(318)
2. 李璜的非基督教思想	(323)
3. 周太玄的非基督教思想	(329)

第五章 《少年中国》与国家主义教育思潮 (336)

- 一、西方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337)
 - 1. 西方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简介 (337)
 - 2. 清末民初西方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 (339)
 - 3. 五四时期国家主义教育思潮概述 (341)
- 二、《少年中国》对国家主义教育态度的转变 (346)
 - 1. 早期会员对于国家主义的态度 (346)
 - 2. 会员教育主张中的国家主义趋向 (352)
 - 3. 学会对于国家主义教育态度的转变 (358)
 - 4. 学会办学计划与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关系 (372)
- 三、《少年中国》对国家主义教育的宣传与批评 (379)
 - 1. 《少年中国》对国家主义教育的宣传 (380)
 - 2. 《少年中国》对国家主义教育的批评 (402)
- 四、少年中国学会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来源 (417)
 - 1. 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论来源 (418)
 - 2. 实行国家主义教育的现实要求 (431)
- 五、少年中国学会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 (437)
 - 1. 政治上的影响 (437)
 - 2. 思想文化上的影响 (442)
 - 3. 教育上的影响 (445)

第六章 《少年中国》与社会主义思潮 (450)

- 一、学会筹备期间的社会主义研究与讨论 (451)
 - 1. 学会开始筹备时的社会主义倾向 (452)
 - 2. 学会筹备期间的社会主义讨论与研究 (454)
- 二、《少年中国》的社会主义研究与争论 (465)
 - 1. 学会成立后社会主义研究与争论概观 (465)
 - 2. 《少年中国》研究与讨论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 (474)
 - 3. 《少年中国》研究社会主义的特点 (490)
- 三、少年中国学会社会主义研究会 (505)
 - 1. 社会主义研究会的由来 (505)

2. 社会主义研究会的组织经过	(508)
3. 社会主义研究会的影响	(509)
四、确立学会共同主义的争论	(512)
1. 会员中的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宣传与活动	(512)
2. 关于确立学会共同主义的争论	(515)
3. 改造学会为社会主义或国家主义团体的争论	(522)
结 语	(532)
后 记	(537)

引言

中国近代的学会运动始于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巨子是主要的组织者和思想宣传者。特别是梁氏在 1896 年还专文讨论学会问题，把学会之源起追溯到二千年前之《易》和《论语》所载及的“以文会友”、“朋友讲习”之风，同时又主要借鉴西方各学均有专会，以致“学无不成，术无不精，新法日出，以为民用，人才日众，以为国干，用能富强，甲于五洲，文治轶于三古”的成功先例，提出要以学会造就人才，联合民力，为强国固民之方，尤为“今日救亡保命，至急不可缓之上策”^①。正是在维新派的积极宣传与组织下，戊戌时期出现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集会结社的高潮。

承维新思潮之绪余，受新文化运动和民主爱国运动之嘉惠，五四时期一部分激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以社团形式组织起来，出版报刊，研究与讨论问题，正如张国焘在回忆中所说：“要救国，就要组织团体，发行一种刊物，作为行动的第一步。当时这种组织小团体的想法颇为流行，不少有抱负的青年都想藉此一试身手，登高一呼。”^② 新文化运动以著名学者为领袖，以全国学生为中心，以出版物为传播新文化的主要媒介，所以在五四前后形成了一个追求真理与解放思想的热潮，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又一个社团繁荣时期。据唐德刚说：“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后，全国青年皆活跃起来了。不只是大学生，纵是中学生也居然要办些小型报刊来发表意见。只要他们在任何地方找到一架活字印刷机，他们都要利用它来出版小报。找不到印刷机，他们就用油印。在

① 梁启超：《论学会》，《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 1989 年，第 1 页。

② 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第 327 ~ 328 页。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两年之间，全国大小学生刊物总共约有四百多种，全是白话文写的。”^① 在这些青年团体和进步刊物中，少年中国学会（简称“少中”）以人数最多、影响最广、分化最激烈而闻名，其会刊《少年中国》月刊是与《新青年》、《新潮》等鼎足而立的著名杂志。

“少中”的发起人曾琦、陈愚生、雷眉生等在1917年留学日本期间，根据“少年意大利”而提出了“少年中国”的构想，他们“拟集合同志，提倡分业，为一真正学会，各就所学，轮流讲演；要以根于学理，按诸事实为主，冀收切磋之实效”^②。到1918年6月底因抗议《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而罢学归国，他们立即与同学好友王光祈及李大钊等筹议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制定章程，发展会员，确定筹备期为一年。到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学会。因此，“少中”萌芽于五四运动之前，是五四前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正式成立于五四运动之后，又是五四运动的产儿。用当时会员的话说，它的发生不外乎“廓清中国不振的病根”与“创造中华民族的生机”这样一种“反过去的精神”，因而学会“含有时代产物的性质”，会员则“或因学识进步，或因地位改变，对于前时代产儿所标举的时代产物自不免发生根本疑问”。因此也“含有时代产儿的性质”^③。总之，“少中”是一个代表时代思潮的有目的有组织的青年集合，如果说“新时代之要求”是学会成立的直接原因，那么“旧人物之失望”则为间接原因。

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文化奋进的时代，也是中国知识界千载难逢的“黄金时代”。梁启超在1920年底曾经概述了社会思潮的特点和共相。他说：“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寢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总之，“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而一种思潮的形成必有“继续的群众运动”为其社会

① 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89年第2版，第183～184页。

② 沈云龙辑：《曾慕韩（琦）先生日记选》，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第16页。

③ 《少年中国学会问题》，《少年中国》第3卷2期，第24～25页。

基础。“所谓运动者，非必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不能分为谁主动、谁被动。其参加运动之人员，每各不相谋，各不相知，其从事运动时所任之职役，各各不同，所采之手段亦互异。于同一运动之下，往往分无数小支派，甚且相嫉视相排击。虽然，其中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通观念焉，同根据之为思想之出发点。此种观念之势力，初时本甚微弱，愈运动则愈扩大，久之则成为一种权威”，渐至流行于社会中。^①应当说梁氏此论也清晰地描述了社会运动与思潮的互动态势。因为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一种学说或主义的产生与传播，必有一个特定的社会背景，然后才产生某种相应的学说或思想；而与之相应的社会运动总是起于少数先知先觉者的一种有意识的宣传，接着社会上一般人受其影响而相与追随，甚至政府也受其影响而起了反应。也就是说，先有思潮的发展，继之以行动，形成了气候，才能为社会普遍接受。在社会学的视野下，一种思潮的产生，必经由社会心理的情感状态到理论状态的转变，主要是通过少数精英分子、学者乃至思想家在上的思想理论的创造与宣传，而处于中间状态的多数人则以情感信念为基础，信从某种思想主张，充当一种联系在上的思想理论与在下的更大多数受众的思想心理的载体，从而使思想社会化、普遍化。在这一过程中，前者可称为社会思想的倡言者和“弄潮儿”，后者充当了中间媒介，下者则为数量最大的接受者。从这个角度上说，梁氏的上述界定既是对历次社会运动的总结，也是五四时代社会思潮的写照。

“少中”作为五四特定时代的产物与思潮的结晶，会员对之也有深切的体认与类似的具体描述。1920年11月，留法会员李璜在实际感受西方的社会思潮与学术文化思潮后，自觉地担当起向国内介绍法兰西哲学思潮的责任，他曾经对“思潮”有如下一段形象的描述：“现在且说这个思潮的潮字：这并不是掀天而降的钱塘潮，也不是茫无涯涘的海洋潮。有人看过两江水交流的所在，一江水是绿的，一江水是暗的，两江水一交流，起初还各分一边，向前流去，愈流愈混，便分不开来，到末了，这两江水另外混成一种灰碧色。一国的学术思潮便好像这样，有他的来源的本色，有他的并流的合色。我们若能够用分析的眼光，从他的合流里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第5页，中华书局，1989年。

追寻出他的来源的本色，再从来源随着看出他的并流所在，我们或者可思过半矣。”^①以江水交流来比喻学术思潮的形成，从而区划其“来源”与“并流”、“本色”与“合色”，李璜的比喻与分析确为至当，不仅揭示了社会思潮形成与发展的图景，而且提出了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学术与本国学术的问题。同样留学法国的李劫人，在讨论法国自然主义小说时专门分析了文学上某种主义的产生与社会思潮的关系，说：文学上某种主义之产生，绝不是仅由一二人的私意而凭空产生的，“在文学上某种主义酝酿之前，他四周的空气已是不同，社会的思潮已是倾注在某一方面，文学不过利用这个时机，把种种业经断定的事实搜集起来，恰与这时的思潮相合，生活相合，自然而然那带特殊性的主义便建设起来了”^②。这种对西方社会思潮的认知不仅揭示了社会思潮缘起于具体的主义或学说这一规律，而且揭示了文学对于社会思潮的推动作用。上述两人在实地感受并研究西方社会文化思潮后得出的结论，与上引梁启超 1920 年对时代思潮的界定，是有着共同旨趣的，即是从学术发展的角度对五四时期社会思潮的共同体悟与观察，说明了时代思潮是有空间性与时间性的，一方面社会意识主要反映现实的社会存在的发展水平，同时也保留历史上形成的反映过去社会存在状况的某些意识材料，两者之结合，以今为主，古今并用；另一方面社会意识继承以往既有的方式方法与手段，同时又根据新的内容和条件对其加以改造补充，并增添某些形式，即所谓推陈出新，思潮之所以名“时代”也。诉诸文化传播规律，就是西方新文化的传入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融合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问题。具体到五四时期，这种思潮既具共相更显个相，体现了动荡或转型时期文化传播与社会思潮的特殊性。

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前后，西方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涌入中国，在民初新旧政体转换以及思想观念更新、社会转型的特殊背景下，在中国各地各类知识分子的反应与迎拒过程中呈现异彩纷呈的风景。一方面它们被作为新的理论新的方法引进或运用，成为了部分先进之士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一方面西方思潮在传入时因为中西传播者自身的

① 李璜：《法兰西哲学思潮》，《少年中国》第 2 卷 10 期，第 1 页。

② 李劫人：《法国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少年中国》第 3 卷 10 期，第 52 页。

问题及环境的局限，其理论体系或原理被误读而扭曲或变形。也因为在情感方面，侵略者与“老师”合于一身，作为“学生”确也很难平心静气地以理性的态度接受或运用这些思想的学理资源。他们在学习与宣传时，凭依各自的体认或根据来源不一的译本的解读，在中国造成西潮理论的竞争；而环境的变迁与时空的差异使之成为了一种“不中不西，既中既西”的畸形物，所谓“中国式……主义”。总之，西方社会的先进与中国落后的比照，使西方思潮自然成为部分立志改造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的追求目标。同时，由于年轻人急切的救国心情，他们为了使西方的这些理论立即实践于中国，自己去设计、组织和实验这些理想目标，因而表现出对于西方理论价值理性的忽视与工具理性的强化，这些思潮的移植也明显体现出认识上的功利性特点。如“少中”会员所说：“‘主义’是一种工具，帮助我解决甚么问题的。要是没有问题当前，即自然再好的‘主义’也用不着了。”^①便是当时青年志士的一种共识。更何况西方的主义与思潮的实用性特征，确实给他们灌注了实践自己社会理想的力量，因而理论或主义的掌握，哪怕是皮毛的或初步的，便很快转化为思想改造乃至现实斗争的理论工具，成为他们实验的指南或起点。反过来，这些试验又对各该思潮的传播、选择和改造产生直接的影响。

“少中”既是五四之前社会思潮的产物，同时对其时及尔后的一些重要思潮的形成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从微观上审视，学会内部在培育某种社会思潮时不同的会员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或者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思想的转型，这样既成为思潮社会化的一种推动力，又成为社会思潮化的注脚。“少中”本着科学的精神，积极开展社会活动，又有大批会员留学西方，因而对于西方社会思潮取一种积极的迎拒态度，既表现为对西方新思潮有选择的传介，更表现为有重点地运用乃至开展大规模的试验。在会刊《少年中国》，会员集中讨论、研究与宣传的社会思潮有妇女解放思潮、工读互助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思潮、国家主义教育思潮、非宗教思潮、科学主义思潮等，他们有时充当了西方社会思潮在中国的倡言者，有时充当西方思潮中国化的实验者，而各自内部又有自身的反对者。因此可以说“少中”在这些思潮变迁中也扮演了“多面孔”

^① 康白情致左舜生，《少年中国》第1卷6期，第58页。